

残留日本人是誰
：东北亚的边境与家庭
中山 大将（NAKAYAMA Taisho）*

一、京都伊拉斯谟计划南京派遣项目

2010年以及2011年夏天，3位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GCOE研究员以及3位京都大学研究生通过京都伊拉斯谟计划被派往中国南京大学。京都伊拉斯谟计划是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以及经济研究科在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金后开始的一个大型研究教育规划项目，其目的是向亚洲以及其他地域的大学派遣年轻研究者以及研究生，以此构建年轻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网络。南京项目（中国社会研究短期集中项目）的特点是招募专门从事中国社会研究之外的年轻研究者，以及对中国社会即将进行相关研究的研究生。

在被派到南京大学之后，日方的研究者在接受短期的汉语培训的同时，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研究生一起进行了共同调查，并于2011年以及2012年在南京大学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今年我们将地点移至京都大学，作为新成立的亚洲研究教育中心（KYOTO UNIVERSITY ASIAN STUDIES UNIT）活动的一环举办了本次论坛。

在今天的发言中，我将在简要总结自己京都伊拉斯谟计划的经历以及GCOE研究员时代研究之后，对自己的最新研究进行相关介绍¹。

二、中国农村调查

京都伊拉斯谟计划派遣期间，我们与南京大学研究生在江苏省的青龙社区、开弦弓村以及安徽省的宅坦村进行了共同调查。调查中，我最为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如何变化，这是我对非社会主义的日本社会与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现代社会进行探讨的着眼点。

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然而，实证性的中国农村研究到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才真正被着手。其原因并非学问所需，而是为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扩大。到了战后以及冷战期，由于日本人很难进入中国大陆进行农村调查，所以当时的学者一直沿用战前农村调查的资料对新中国以前的农村社会进行研究²。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人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相关调查变得相对容易，中日学者的交流也日渐增多。这之中包括日本的农村社会研究者和农村史研究者与中国的研究者所进行的有关人民公社解散后的中国农村的共同调查。近年来在日本学术界，有关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各方面的中国农村研究也出现很多成果。

我们的农村调查也主要以观察人民公社的解散过程以及解散后中国农村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为目标。具体的调查内容及成果，请参考我们的报告书，在此不多赘述³。

* 北海道大学斯洛夫研究中心，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原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GCOE研究员（2010年4月至2012年3月）

¹ 本文是在笔者2013年发表的《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兰信三编著《帝国之后人的迁移》勉诚出版，2013年）这篇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详细内容请参照以上论文。

² 石田浩，1986，《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构造の研究》，晃洋书房。

³ 中山大将、巫觐、李德营「中国农村的公共宣传：从“原子化”以及“组织化”的观点来看」（櫻田涼子・中山大将編『京都エラスムス計画2011年度中国社会研究短期集中プログラム成果報告一京都大

从结论来讲，正如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正在不断瓦解，但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仍然存在。对此，日本社会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是经济结构，然而通过以上的农村调查，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够准确的。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应该来自政治结构的差异，即民主集中制与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差异。议会制民主主义唯恐民主集中制，因为民主集中制的一党专政与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不能两立。相反，民主集中制也唯恐议会制民主主义，因为选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对民主集中制而言，重要的是学习正确的思想，而对议会制民主主义而言，自由议论则最为关键。现实之中，这两种政治结构之间的对立、不信任感以及一些其他因素最终引起了冷战，同时由于这一对立，商品、金融、信息以及移动也附带地受到了限制。

三、萨哈林残留日本人

今天我所要讲的“残留日本人”正是在日本帝国的瓦解以及冷战持续之中产生的一个悲剧群体。近十几年来，“流散”一直是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关键词。然而笔者认为仅仅从“流散”这个角度还不能真正了解帝国及冷战持续之中因人口移动及其限制而产生的悲剧。基于此，笔者在 GCOE 研究员阶段主要从家庭的角度对国界的变动进行了考察。

说起“残留日本人”，在日本大家立刻就会想起中国残留日本人，特别是中国东北的残留日本人，但我所关注的则是不为日本社会的大多数人所知的萨哈林（桦太）残留日本人。我认为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的产生并非仅仅是因为国界线的变动，社会主义世界与非社会主义世界之间不幸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另外，除却宏观的政治性因素，家庭这一微观因素也很重要⁴，这一点在我之前的研究中已得到强调。

四、萨哈林岛与冷战

萨哈林岛是位于黑龙江河口对岸的狭长岛屿，与地处萨哈林岛南面的北海道本岛大小相近。中文文献中一直将萨哈林岛称为“库页岛”，“库页”指的是萨哈林岛的原住民“阿伊努族”。直至瑯珲条约（1858年），清帝国与阿伊努族等的原住民都有贸易上的往来。自19世纪末期至二战结束，萨哈林岛的领属不断在俄罗斯帝国和日本帝国之间摇摆。1905年朴次茅斯和约之后，萨哈林岛北部归属俄罗斯帝国，南则归属日本帝国，这即是日本的殖民地“桦太”，之后日本人和朝鲜人先后从日本本土及朝鲜半岛迁移至南萨哈林（桦太）。

1945年8月23日，苏联军占领南萨哈林并封锁宗谷海峡，之后，事实上的日苏国界线从北纬50度（萨哈林岛的大致中央）下移至宗谷海峡，这是萨哈林岛20世纪的第四次国界线变动⁵。1945年8月苏联军进攻南萨哈林的之前，数据显示当时的南萨哈林约有38万日本

学・南京大学若手研究者共同フォーラム報告論文集一』京都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京都エラスムス計画」事務局、2012年1月16日、60-65頁），以及中山大将、巫靚、李德营「中国农村的公共宣传：从“原子化”以及“组织化”的观点来看」（櫻田涼子・中山大将編『京都エラスムス計画2011年度中国社会研究短期集中プログラム成果報告一京都大学・南京大学若手研究者共同フォーラム報告論文集一』京都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京都エラスムス計画」事務局、2012年1月16日、60-65頁）。

⁴ 中山大将，《桦太移民社会的解散以及变样：有关战后萨哈林的移动以及运动》《移民研究年报》第18期，2012年，第101-119页。

⁵ 随着俄国革命及之后内战的发生，日军于1920年占领了北桦太实行了军政（保障占领）。之后，1925年根据

人、2万5千朝鲜人、2千原住民以及200名左右的外国人。截至1945年8月23日，大概有9万日本人及朝鲜人疏散至北海道。之后约有2万4千名日本人及朝鲜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迁至北海道。1946年12月至1949年7月期间，有27万左右的日本人被遣返至日本本土，而同时50万左右苏联人从大陆迁移至萨哈林岛。

然而事实上截止1949年8月，依旧约有2万3千朝鲜人和部分日本人留在萨哈林。根据笔者的调查，1949年8月南萨哈林约有1千4百名日本人。这些萨哈林残留日本人是怎样的群体？对于冷战后开始的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归国运动，日本政府为什么断言“萨哈林没有残留日本人”？对此，今天的发言主要试图从日本政府的档案、各种团体的资料、萨哈林残留日本人以及朝鲜人的采访⁶中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

五、“疏散”⁷以及“归国”⁸

第一批离开萨哈林岛的日本人是在1945年8月13日至23日期间“疏散”至北海道的。而第二批则是1946年12月至1949年7月期间的“归国”人员。由于这第二批的“归国”基于美苏之间的协定，原则上当时朝鲜人是不能离开萨哈林的。然而，日本政府相关部门的记录却证实当时“归国”的人员当中包括了朝鲜人。为此，日本政府始终未能明白个中原因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要搞清其原因，还得从“朝鲜人究竟指谁”说起。

日本政府认为朝鲜人指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拥有朝鲜户籍的人¹⁰，而与此不同的是，苏联政府却认为朝鲜人指的是在苏联国内身份证上记载“朝鲜民族”的人。苏联政府于1946年对占领前就住在萨哈林的日本人、朝鲜人等居民发放了身份证，当时苏联政府要求居民自行向有关部门进行民族申报。这之中，有些人虽然拥有朝鲜户籍，却在申报时声称自己是日本人。虽然在日本政府看来这些人依然是朝鲜人，但由于苏联政府认为他们是日本人，因此在1946年12月至1949年7月的“归国”期间，他们被允许上了“归国”船。“归国”船回到日本之后，即出现了所谓朝鲜人来到日本的情况。由于同属东亚人，再加上殖民的影响，无论是外观还是语言，朝鲜人与日本人都没有什么区别，苏联官员无法辨别也是情有可原。

六、冷战期归国

1956年日本与苏联实现邦交正常化，从这一年起至1959年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得以集体归国。这之中不仅包括约800名萨哈林残留日本人，他们的朝鲜人家属（配偶、孩子等）1,600位也从萨哈林来到日本。根据冷战期归国者的乘船名册的统计，归国的家庭中约7成是妻子

日苏基本条约，日军从北桦太撤退，苏联统治北桦太。这就是萨哈林岛在20世纪的第2和第3次国界线变动。

⁶ 主要参照的档案是日本国外交部外交史料馆收藏的以下史料：从《苏联地区邦人引扬关系一件引扬实施关系 第四卷》到《第九卷》，《苏联地区邦人引扬关系桦太残留者引扬关系》。另外，日本国会会议录（<http://kokkai.ndl.go.jp/>）以及在日韩国历史资料馆收藏的李义八所赠送的文献也作为史料有所引用。笔者自2009年至2012年对15位萨哈林残留日本人以及9位萨哈林残留韩人（包含归国者）进行了个人史（Life History）的调查。协助笔者进行调查的组织以及团体如下。日本方面包括日本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北海道归国者支援交流中心、全国桦太联盟。俄罗斯方面包括萨哈林北海道人会、萨哈林州韩人会。韩国方面包括安山市故乡之村永住归国者老人会。这之中日本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为笔者提供了9种名册，以此大大促进了残留日本人数量分析的研究。特借此机会对他们表示感谢。

⁷ 日语中称为“疎開”。

⁸ 日语中称为“引揚げ”。

⁹ 函馆引扬援护局《函馆引扬援护局史》函馆引扬援护局、1950年、第44-45页。

¹⁰ 本研究也为了方便沿用这个定义。

为日本人、丈夫为朝鲜人的家庭，并且这之中 8 成是战后形成的，余下的 2 成是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就已形成的家庭。由此可知，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家庭有 7 成是因家属中有朝鲜人而没有得到遣返，余下 3 成是特别技术人员等的日本人家庭。

冷战期间的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归国过程中，出现了“自称日本人的朝鲜人”问题。与战后第二次撤离相关，冷战期间回到日本的萨哈林残留日本人中包括了拥有朝鲜户籍，但苏联国内身份证上是日本人的朝鲜人。在我的采访调查中，我曾遇到过两位这样的朝鲜人。一位是因为当时自己的朝鲜人工头说持有日本人身份证比持有朝鲜人身份证更方便，因此战后申请了日本人身份证。而另一位则是因自己的养父母是日本人，于是在冷战期间申请了“回到”日本。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以上的两位朝鲜人在战前都跟日本女性结婚，但他们的妻子在 1945 年 8 月“疏散”时就已经跟孩子一起回到日本。据他们所讲，他们申请来到日本的最大原因是希望在日本能见到他们的家人。由此可见，日本帝国时期与日本人组成家庭，是引起战后萨哈林朝鲜人来到日本以及自称日本人问题发生的原因。

七、丰原事件以及假结婚问题

冷战期间由萨哈林来到日本的朝鲜人丈夫都是因为妻子想回来才来到日本的吗？事实上并非如此，萨哈林朝鲜人中有一部分人是主动希望“回到”日本的，我们可以从“丰原事件”以及“假结婚问题”的分析中看得出来。

丰原事件是在冷战期归国开始之后，发生在萨哈林州都南萨哈林市（“丰原”是 45 年之前，南萨哈林市的日文称呼）的事件。日本人可以归国的消息在当地传开之后，约有 800 位朝鲜人涌到官厅申请“归国”，虽然这些人并没有日本妻子。为了制止这些人“归国”，当地的朝鲜共产党员与这些人发生了争执。朝鲜共产党员不能准许萨哈林朝鲜人从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共产党领导的理想的祖国苏联去到颓废的资本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日本。而“假结婚”则正如字面所表达的意思，指的是当时试图通过与单身的日本女性假结婚来到日本的朝鲜男性的例子。这样的案件在当时屡屡发生。另外，根据桦太归还在日韩国人会（冷战期间跟日本妻子一起回到日本后，朝鲜人成立的团体）20 世纪 70 年代的调查，在希望回到韩国或日本的萨哈林朝鲜人之中约有 3 成是希望回到日本。这些朝鲜人为何希望回到日本？在日本有他们的家人、亲戚、朋友，或是不习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希望回到一直以来生活的日本社会等等都是能够想到的理由。

冷战期间没有回到日本的很多人，大多都是因为她们的朝鲜丈夫不同意回到日本。残留日本人之中很多人已获得朝鲜人身份证，取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或者苏联国籍的人也不乏其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是不会允许他们回到日本的。因此，以女性为主的萨哈林残留日本人被淹没在了萨哈林朝鲜人社会和苏联社会中。

八、日本政府的态度的变迁

20 世纪 5、60 年代，日本政府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归还“苏联地区未归还者”。“苏联地区未归还者”不仅包括上文所讲的萨哈林残留日本人，还包括被苏联强制滞留的西伯利亚原关东军军人等。当时实现西伯利亚日本人归国是日本政府最亟待解决的事情，而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的冷战期归国只是一个附带的收获。

尽管“自称日本人的朝鲜人”以及“假结婚”问题在当时被日本的一些国会议员提出，但日本政府依旧从“人道主义的观点”继续准可这样的朝鲜人入境，其背景是日本政府希望规避这

些问题的表面化，以防止苏联政府因此停止日本人的归国项目。而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因家庭的分崩离析而放弃回国，尽管当时的国会中有人对朝鲜人的入境本身进行了批判，各个部门还是依旧默认了朝鲜人的入境。

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认为至今依旧留在苏联，没有回国的日本人是因在当地已组建家庭等基于个人意愿而留下的。然而萨哈林方面，通过萨哈林残留日本人与日本的家属的通信内容，国会最终认识到依旧有希望回到日本的残留日本人。

然而，到了80年代，日本政府突然改变了之前的想法，他们认为萨哈林残留日本人指的是音信全无的人，而能够确认到的残留在萨哈林的日本人都是基于自己的意愿留在那里的。

日本政府的立场为何会发生如此改变？为了了解个中原因，我们需要从日本政府这一时期之前的内部动向来分析。1965年日本的法务部、外交部以及厚生部举行了一次三方协议（日本国外交史料馆能浏览到当时协议发言的概要）。日本政府从冷战期归国者口中得知大部分的萨哈林残留日本人拥有朝鲜人的家属，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取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国籍的人不断增多，对日本没有思慕之情或生活经历，不会日语的年轻人逐渐增多。为了规避萨哈林残留日本人问题的复杂化，当时的会议上有人提出“应在必要的时候停止（归国事业）”。在这次协议上，有代表认为50年代末的冷战期归国是一次失败的举动，因为接受了很多没有日本国籍的朝鲜人。日本政府为阻止国内民族的复杂化，因此希望停止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的归国事业，80年代的想法在这个阶段就已经显现出来。

而到了90年代，日本政府对后冷战时期归国运动一直持有以下态度，即“萨哈林没有日本人”，即使有也是他们“自愿留下的”。

九、结论

从冷战期的归国开始后发生的丰原事件、假结婚问题以及自称日本人的朝鲜人问题等，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萨哈林存在着因某种原因希望“归国”到日本的残留朝鲜人。然而，日本政府决却因他们没有日本内地户籍（二战结束前，日本本土户籍与殖民地户籍是分开管理的。），不承认这些原日本帝国臣民朝鲜人是“残留日本人”。

而即使拥有内地户籍，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的大多数是朝鲜人的妻子或孩子，他们接受着萨哈林朝鲜人社会和苏联社会的两重同化。因为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日本政府为极力规避民族的复杂化，而将这些人认为是自愿留在萨哈林，并将他们从残留日本人中排除。到了80年代，萨哈林残留日本人这一概念已经空化，对日本政府来说萨哈林残留日本人指的是音信全无的人，而能够确认的人都被认为是自愿留在那里的。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1986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以及苏联瓦解，日本人能够相对容易地进入到萨哈林岛。加上支援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的归国的市民运动团体以及大众传媒的关注，日本政府的态度才逐渐改变，最终实现了后冷战期的归国。

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留在萨哈林，与忠诚于国家或民族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留下的原因其实只是作为一个人，优先选择了眼前最为重要的生活和家人而已。他们的残留其实应该归结于一般人所无力改变的国界线变动以及冷战的发生。她/他们的悲剧不是离散在祖国之外，而是被迫与自己之前的家人以及生活圈分离。